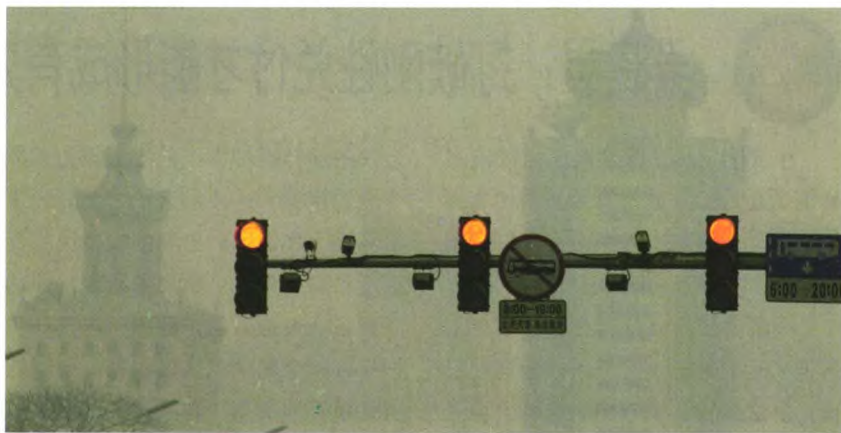


京剧、京腔、京味、京韵，作为中国的民族象征，一直为天津乐道。但京霾，作为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象征，又似愈演愈烈，对这种损害健康的气象灾难，人们既深恶痛绝，又万般无奈。

近年来，一进入冬春季节，我国华北的京津冀地区就时常笼罩着雾霾，人们议论纷纷，但时至今日，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对雾霾问题仍没有一个公开的、权威的评估报告，也没有对公众防护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引导，似乎人们只能耐心地忍受，静心等待自然界的风雨恩赐来缓解这种气象的煎熬。

京霾不只是北京的问题，而是以北京心脏地带为圆心，以同心圆方式向周边方圆500公里范围内扩展的事关芸芸众生生存和发展模式的问题。对于京霾，作为事后诸葛亮进行反思，实际上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，既是受害者，也是加害者；自害自，既活该，又须求解。

解决京霾，北京的空气质量真的只能靠风吹雨打吗？这应从京霾的形成进行分析。京霾到底是怎样形成的？从一些纷繁的现象看，应该说，雾霾是人类对自身的惩罚，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，滥用市场力量，崇尚泛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。为了扩大内需，近十余年来国家通过房改和车改来鼓励个人增加消费，同时减轻财政负担，这本是一个重大的正确的宏观政策选择，但在贯彻执行过程中，人们将科学决策和战略规划的任务让位给市场，指望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能优化相关的资源配置。于是，房改政策与市场化的房地产开发对接，主城改造和外围的新住宅越建越多，施工现场比比皆是，过去由单位集中公租房



在京霾中 感受市场决定

■ 万存知

的政策改为由个人根据经济能力和偏好分散自购住房的政策。人们的居住日益分散化，居住地与工作地相距越来越远，过去可以集中接送职工上下班的班车，因居住分散和公车改革，而不得不取消，取而代之的是，人们按月拿着有限的交通补贴，上下班东奔西跑，南征北战，公交车既拥挤又不便，骑自行车又太远，只能购小汽车自驾上下班。当这种现象日益普遍化以后，马路越修越宽，进出主城的道路越来越堵，自行车车流越来越稀少，汽车尾气污染越来越严重。在北京，城区内大量施工现场扬尘和汽车尾气是对雾霾的巨大“贡献”。

为了提高北京的首都品味，北京在根除污染源的同时反被再污染。北京城区许多尾气排放不达标的车辆，按规定不能再在城区行驶，结果，其车主大多将其转手卖给了北京周边地区的农村。北京城区的一些排污大户企业，也大多按规定向北京周边的欠

发达地区转移，周边欠发达地区从自身利益考虑，一方面要生产，要就业，要财政收入，要政绩，无工不富，有工业就有希望，大多将这些高耗污染企业全面吸收；另一方面在企业开工后的防污、治污上，既没有内在动力，也没有经济实力，更不可能采用先进的技术，其结果是，在污染自己的同时，反过来通过大气环流再污染北京。人们常将北京周边农村焚烧秸秆作为雾霾的重要原因，实际上要看到，焚烧秸秆除了制造烟雾并产生少量的粉尘外，并不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，与工业污染似有质的不同。

为了增强北京作为首都的活力，北京广纳各方英才，但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北京后，城市的承载能力已达到极限，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污染。北京现有常住人口近2000万，流动人口难以准确统计，有的短期逗留就离开了，有的长期滞留谋生，在北京滞留半年以上的非常住人口，估测在

1200 万左右，这些非常住居民的从业方式既自由化又多样化，许多在小巷中开小门店或作坊，在城乡结合部租住简易房，结果是，众多小巷中的餐饮烧烤及其煤炉，没有集中供气供热，简易房中的煤炉生活和取暖设施，其废气等污物直排，成为城区空气污染的重要制造源。再者，城区人口过多，生产生活用水量剧增，地下水过量开采，加重了北京缺水和干燥的窘境，大气环境缺乏水汽，近年来雨雪量递减，对大气污染物的自然净化能力减弱，也加重了空气污染的程度。

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短期内还很难对其作出好坏优劣的评判。但反思这些现象的发展过程，似应在根本上从经济中寻找其是非曲直。首先，须科学地认知城市，特别是首都城市的经济功能。城市是人流、知识流、信息流、物流等资源的集散地。根据国际著名城市学家的论证，城市是人类的一大发明，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，也是最有利于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活动方式。但不同的城市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，因地理、贸易、产业和人口等原因，各有其自身的特点。可以说，城市是因人们的经济活动而生、因经济功能而兴、因经济实绩而别。但在中国过去，人们曾习惯为将一个消费城市转化为生产城市、将市民转化为产业大军、将供产销一体化、将经济总量快速扩大而感到自豪，结果是中国的城市众多，但大中小城市一个样，所得的城市病也一个样。具体到北京这个首都城市，长年围绕数千万居民的衣食住行紧抓经济建设是对的，但在经济功能的定位上，似有许多值得反思改进之处。例如，保护传统与推进现代化的关系，老城改造与古城保护的

关系，产业制造与产业创造的关系，城市规划与城市功能区划分的关系，经济门类的齐全与合理社会分工的关系等等。总体感觉是，北京作为首都城市，其经济功能过于单一、过于集中，结果造成城市功能不全、负荷过重。

其次，须正确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在推行经济自由民主过程中，应防止泛自由主义泛滥，防止盛行无政府主义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，应强调集中统一，这在欧洲十六至十七世纪城市发展过程中，城市土地统一规划已经作为一条铁律加以遵守，应防止城市规划分级分权分类管控。但在我国实践中，为照顾地方利益，为兼顾区域平衡，城市规划大多采取分级管控，重微观、轻宏观，重经济因素、轻社会文化福利因素，重解决当前问题、轻长期战略统筹。结果是，城市挖了填、填了挖，建筑物越建越快、寿命越来越短，城市规划一改再改，最后变得没规划，地方微观有权主体想怎么建就怎么建，在城市生活中除了感受紧张外，别无他获，城市日益变得可怕、无奈和找不到灵魂。

在人口自由流动过程中，农民工潮涌进城，似乎分享发展的红利，就是进城享受那种繁荣。农民工进城后，其自由择业、自由从业，在给城市注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。城市的住房、医疗、交通、教育、城管等资源，历史上是按照常住居民及其贡献的财政收入进行配置的，大量接纳进城的外地务工人员后，由于管理上的原因，城市收缴农民工的税费较为困难，城市所提供的既定公共资源为更多人所享受，带来的是城市服务功能平均水平的下降，最后，大家却都对这个城市不满意。毋庸置疑，北京的主要大街确实建设得像个

大国的首都，但其众多的小巷，人们随意开门店摆摊设点，车辆乱停乱放，脏乱差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根治，局部地区还有加重的趋势，一些僻街小巷，大有乡村化的趋向。城区基层政府组织反映，只要不出现杀人放火和群体性事件，对这些日常的乱象管不住、管不了，也没法管。对这其中的受益者，我们不能不说，真是太自由了；对这其中的受损者，我们不能不说，真是太无辜、太无助了。

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列出一长串清单。可以看出，政府为了增强经济的活力，放松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原则是对的，但也不能绝对化，在尊重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前提下，政府还得发挥宏观调控作用，该管的还得管，政府管理不到位，势必出现市场的自由散漫和混乱，甚至出现无政府主义，进而危害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。

最后，无论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调控，其选择权都应该是有限的，即都应该受到市场决定和政府调控双方均认同的规制的约束。就京霾这个议题而言，市场决定无疑太过自利、自由，市场主体几乎不受法治的约束，制污排污的成本几近为零，且几乎处于不受约束状态；在这个问题上的政府调控，应该说的不完全到位的，也缺乏法治的依托，除了像奥运会和亚太经合会这样的重大安排外，日常也缺乏治霾的跨行政区域的政府间合作。若在治理京霾这个问题上，市场主体和政府调控都能走上法治的轨道，则消除京霾的危害的时间会短些；若任由人们受伤害到经济难以为继，市场力量自然觉醒，则消除京霾可能会牺牲一两代人，那代价就太大了。□